

内
港
春
秋
—
苏
州
河
可
码
头
的
变
迁

春秋内港

苏州河码头的变迁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1252.1/1

内港春秋

——苏州河码头的变迁

上海市内河装卸公司工人写作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内港春秋

——苏州河码头的变迁

上海市内河装卸公司工人写作组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5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 3.375 字数 50,000

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1171·138 定价：0.19元

毛主席语录

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（帝国主义的压迫、资产阶级的压迫、封建势力的压迫），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，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；因此，他们在革命斗争中，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。

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。

写在前面

苏州河是条古老的河道，苏州河码头的形成，也有近百年历史了。在解放前漫长的岁月里，数以千计的苏州河码头工人，深受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、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沉重压迫。霸占着码头的资本家、封建把头，把码头工人当作“两条腿的牛马”，不论寒冬腊月还是盛暑炎夏，他们用皮鞭、棍棒逼迫码头工人，肩负沉重的货物，在跳板、石阶上奔跑。当时流传的一首歌谣：“码头工，码头工，吃不饱，睡‘地龙’，三十岁腿发抖，四十岁腰弯弓，五十岁没人要，到头还是两手空。”正是解放前苏州河码头工人悲惨生活的写照。

苏州河码头工人也有英勇斗争的历史。他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展开过不屈不挠的斗争。

解放后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，通过反霸斗争、民主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，又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，特别是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苏州河码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社会主义的新河港变得越来越雄伟壮丽，码头工人真正成了码头的主人，过着幸福的生活。“这新

社会，咱们码头工，翻身作主多自豪，生老病死有依靠，共产党、毛主席恩比天高！”同样表达了苏州河码头工人的共同心声。

苏州河码头的历史，是阶级斗争的历史，这对青年一代来说，则是进行阶级教育和路线教育的具体教材。为此，我们编写了《内港春秋——苏州河码头的变迁》这本小册子，以真人真事，反映苏州河码头工人过去的辛酸血泪和今天的翻身变化。这对叛徒、卖国贼林彪效法孔老二“克己复礼”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，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，也是有力的批判。

我们写作组，是在中共上海市内河装卸公司委员会和公司工会直接领导下，开展写作的。在写作过程中，得到中共上海市交通运输局委员会和局工会的关怀、指导，还得到广大工人的大力支持和有关方面的热情协助，他们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材料和线索。对此，我们表示衷心感谢。我们写作组的成员，都是苏州河码头工人，由码头工人来写自己的历史，这是新的尝试。由于我们政治水平和写作水平有限，没能把苏州河码头工人的历史，充分、形象地反映出来，书中一定还存在不少错误和缺点，恳切地希望读者提出批评和意见。

上海市内河装卸公司工人写作组

一九七五年九月

目 录



从苏州河码头的形成谈起

谈起码头，人们会自然地想到那停泊着万吨大轮的黄浦江码头。然而，亲爱的读者，你也许还不太了解苏州河码头吧？我们苏州河码头工人，习惯于把苏州河码头称作“内港”，以区别于“外港”——黄浦江码头。这本书，就是要谈谈内港——苏州河码头的变迁。

关于苏州河码头上的事，得从码头的形成谈起。

苏州河又叫吴淞江，早在公元三世纪（三国时），就是太湖主要的泄水道，河广水深，源畅流疾，沿岸人烟稀少。十四世纪以后，明、清政府先后征调大批民工，开范家浜（今天市区附近的黄浦江）入海，浚治吴淞江以接黄浦江，才大致形成今天的苏州河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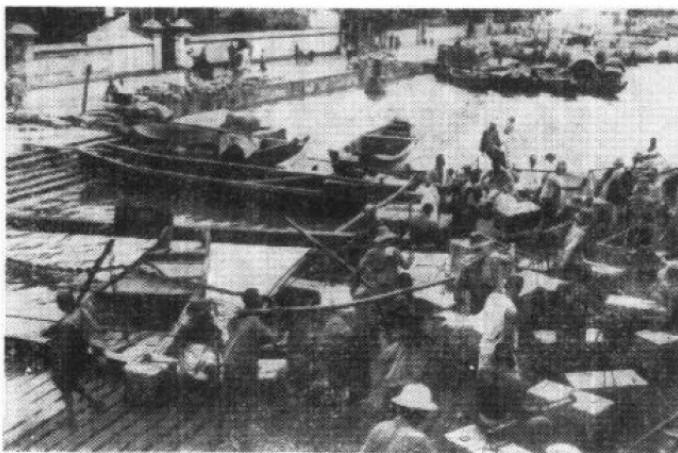
江海交通便利，为上海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。随着上海成为贸易的重镇，物资交流日益繁忙，苏州河来往船只增多，沿岸才逐渐出现了供装卸使用的码头。当时都是一些简陋的烂泥码头，装装垃圾，卸卸柴草，或是用于装卸粮食、土布、烟草、茶叶、酒类等各种土产。

苏州河码头的演变，跟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，也密切相关。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，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《南京条约》，上海在一八四三年被开放为通商口岸。一八九六年，霸占着黄浦江港口的外籍“港务长”，控制了苏州河码头的管理权。帝国主义的武装警察，也侵入苏州河码头，迫害中国人民，保护侵略者的利益。

帝国主义凭借不平等条约攫取的特权，通过码头把过剩的洋布、洋纱、面粉、奶粉等洋货，运来中国倾销；又通过码头，把中国的生丝、茶叶、棉花、矿砂等重要原料劫回本国。码头成了侵略者的吸血管。一九〇〇年，英商就在今天浙江路桥附近的苏州河边强占码头，开设了怡和打包厂。每当土产收购旺季，英国商人就租赁船只，挂上“怡和洋行”的招牌，沿苏州河深入内地，搜刮物资，然后集中到上海，再打包运往国外。帝国主义不以此为满足，他们垂涎中国丰富的原料和廉价的劳动力，更直接在上海开设工厂。一八八九年，日本内

外棉公司在上海开设分公司，一九一一年又在上海开设第一爿纱厂，叫“水月纱厂”。到一九三六年，这个公司就在苏州河边霸占大量土地和码头，共开设了十一爿纱厂。沪西苏州河沿岸，密密地分布着内外棉公司的厂房，附近河边被他们霸占的码头，一个接着一个。此外，外国商人设立的江苏药水厂码头、开滦煤栈码头，也相继在苏州河边出现。

十九世纪末、二十世纪初，上海的民族工业如纺织业、面粉业、卷烟业等，陆续产生。为了运输和用水方便，这些厂也大都开设在曹家渡以东的苏州河边。这一带也就相继建立了一个个装卸原料和产品的码头。如一八八三年开设的上海裕泰恒火轮面局，一八九四年开设的裕源纱厂，一九〇〇



早年的苏州河码头(之一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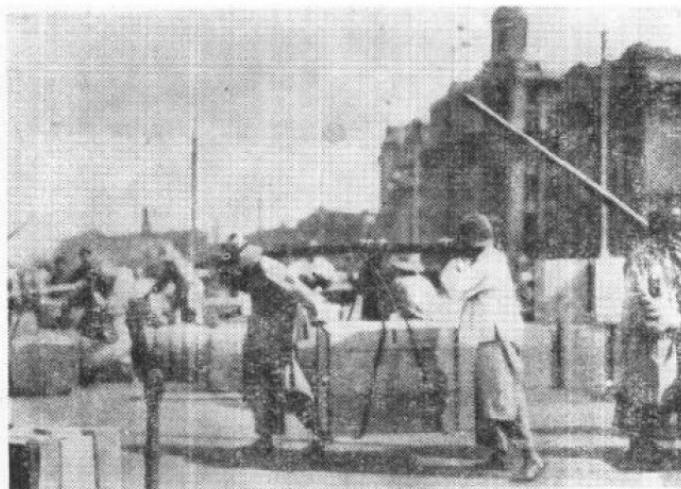
年开设的阜丰面粉厂，就是中国资本家开设的第一批工厂。到了一九一三年，仅面粉厂就开设了十三家，产量占全国一半以上，苏州河边的码头，也随之越来越多。

抗战前夕，苏州河沿岸已有一百多处码头和仓库。在靠近西藏路桥（泥城桥）一带，有“浙江”、“四行”、“大陆”等四十八爿银行仓库码头；在新闸路桥附近，集中了当时万盛泰、协昌德、八达等米行的粮食码头；在新闸路、恒丰路、淮安路的苏州河边，则是一些煤栈码头。另外，从外白渡桥到周家桥漫长的河岸上，还分布着许多石粉厂、纺织厂、面粉厂、米厂、火柴厂、木材厂的码头。

苏州河边靠搬运货物为生的“小工”，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已出现，当时被称为“脚夫”；把持装卸业务的则叫“脚头”。“脚头”控制着码头，剥削“脚夫”，就是后来码头上的包工头。起初，码头上没有固定的工人，只是一些农民趁农闲来到上海，在码头干上三、四个月的活，挣些钱回家。后来，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加深，农村经济破产，贫苦农民为了谋生，逐渐流入城市。尤其是一九二七到一九三〇年间，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，连年遭受兵、虫、旱、涝种种灾害，湖北、苏北等许多地方，灾民大批涌来，城市失业工人也大批上码头谋生，这样就给苏州河码头带来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，码头上有

了专门搬运货物的固定的码头工人。但固定的码头工人，人数不多，大多数码头工人还是整天为找活做而奔波，行止不定，被称作“野鸡工”。

旧上海苏州河码头、仓库的中外资本家，为了加强对码头工人的统治和剥削，都狡猾地不和码头工人发生直接的雇佣关系，而是利用包工头，



早年的苏州河码头(之二)

对码头工人实行统治和管理。因此，苏州河码头上，包工头各霸一方，形成了许许多多的“封建王国”。有的大包工头，还把自己包揽的码头业务，再分别转包给其它小包工头，通过这些小包工头，去雇工完成。这群凶恶的吸血鬼，巧取豪夺，层层克扣，吮吸工人的血汗。大小包工头，都和反动政权和封建恶势力紧密勾结，垄断包工，谁要想上

码头找点活做，都非得找这些包工头不可，并遭受他们沉重的压迫和剥削。

苏州河码头和码头上罪恶的剥削制度，就是这样相继形成的。



“两条腿的牛马”

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苏州河码头上又是怎样的情景呢？

还是听听“老码头”的控诉吧！从旧社会过来的码头工人——“老码头”，每当提起过去，总是抑制不住满腔的仇恨，辛酸的往事一桩桩涌上心头。

流不尽的血和汗

一九二八年秋天，裴金生的家乡遭了一场大水，大水吞没了他家的几亩佃地和仅有的一间破草房，眼看颗粒无收。大水还未退尽，地主就上门催租逼债。裴金生走投无路，只得背井离乡，一路乞讨来到上海，在苏州河码头上做“野鸡工”。

每天天不亮，裴金生就披着搭肩布上码头，等

候包工头发工牌。拿到了工牌，这一天的生活才算有着落；有时候一连跑几个码头，都拿不到工牌，这天就只好断顿挨饿。但是即使拿到了工牌，这天也不是容易挨过去的。

裴金生那时经常在新闸路桥堍的小米码头，替万盛泰米行、八达米行夯粮包。夯运粮包，除了一块破烂的搭肩布外，没有其它任何劳动工具。所夯米包、麦包、豆类包，每包都在二百斤左右，面粉包五十多斤，每次则要夯四包到六包。裴金生



夯 包

和十几个工人，从早夯到晚，要把河里三、四条船的粮包夯进仓。米行老板为了节省仓位，在仓库里用几条七、八寸宽的跳板，一块块搭起来，要工

人把粮包堆得齐屋顶高。就这样，裴金生肩负沉重的包子，终日奔走在码头和仓库之间。

一年盛夏，火辣辣的太阳把地面晒得滚烫。裴金生赤着脚，光着背，夯着二百多斤的黄豆包，先从船上夯上岸，走一大段路，再把包子夯进仓。他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在行列中，豆粒般的汗水直往下淌，早湿透了裤腰。

炎热炙人，粮包又重，人人都口渴难耐。裴金生和几个工人跑到水桶边，想喝点水，恰巧被包工头看到。这家伙大发雷霆，一面恶狠狠地咒骂：“他妈的，给你们上码头赚钱，还想偷懒！”一面从墙角拣起一把扫帚，伸进水桶去搅了几搅，桶里顿时泛起一层垃圾。工人们一口水都没喝着，强压住怒火，又夯起了包子。

裴金生精赤的肩膀，渐渐被粗糙的麻袋磨破了皮，汗水淌到伤口上，阵阵作痛。包子再也不能上肩了，又不能不干，他只得用右手把包子夹在腰间，歪着身子，向前挪步。夹着几百斤重的包子，在平地上走尚且不容易，更何况走在摇摆不定的船上！舱面上的黄豆包夯完，要把船舱里的包子夯上来，还得走一条又陡又狭的跳板。裴金生从闷热的船舱里夹起黄豆包，气喘吁吁地爬上跳板，汗水像断了线的珠子，直往下滴。他好不容易爬到舱面，正要上岸，船身一晃，一步没有踩稳，就一头

栽进了很深的船舱，右脚当场扭伤，痛得怎么也爬不起来了……

那时候，包工头订下这样的“规矩”，工人干活不论出了什么事故，只要不做到收工，就别想拿到一点工钱，叫做“烂工”。工人受工伤，却成了包工头捞油水的机会。裴金生累死累活地干了大半天，受了重伤，可是一个钱也拿不到。他的脚一天不好，一天上不得码头，就只有忍饥挨饿。旧社会有过多少这样的码头工人，倒毙在街头！

比登天还难

一九三五年冬天，天气特别冷，一场大雪过后，屋檐挂下了尺把长的冰凌。北风掀动刘贵洪家用搭肩布代替的门帘，草棚被吹得“吱、吱”着响。刘贵洪冻醒了，从破席子上爬起来，咕嘟咕嘟喝下一碗菜粥汤，就拉下搭肩布，披在肩上，一步步向四行仓库码头走去。那时苏州河码头上许多有楼的仓库，全靠工人夯着或背着货物进仓、上楼，几十级甚至几百级阶梯，一天要上下跑几十次到一百多次，跑到后来，个个累得踉踉跄跄，提不起腿来。

这些天，四行仓库的烟叶包子特别多，底下几层库房已经堆满，河面上还横七竖八地泊着许多待卸的烟叶船。这是一批从安徽凤阳来的烟叶，包装体积特别大，三百六十斤一包，摊在地上足有